

清華簡《芮良夫毖》與 周厲王時期的外患^{*}

程 薇

周厲王胡的統治時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轉折點，由於他的暴政，發生了國人暴動，導致王室政權由大臣共伯和來執掌，他自己也被迫逃亡到彘，從而出現了共和行政。關於共和行政之前周厲王在位期間的情況，史書的記載極為簡略。像《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雖都有一些相關內容，但主要記載的是周厲王親信佞臣榮夷公進行“專利”以及周厲王實行“止謗”的事情。然而，根據《史記·周本紀》及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制定的年表來看，周厲王的在位時間長達三十七年之久〔1〕，因此，周厲王統治期間所做的事情肯定不止於“專利”和“止謗”。然而由於史載缺略，以往的學者很少涉及周厲王統治時期其他的歷史情況。幸而天不愛寶，由於青銅器銘文及簡帛等出土文獻不斷被發現，使得有關周厲王時期的史事內容得以日益豐富。其中清華簡《芮良夫毖》提示我們，周厲王統治時期存在着極其嚴重的外患。

《芮良夫毖》簡長 44.7 釐米，共二十八支，可惜有部分竹簡殘斷缺失。該篇簡文滿簡書寫三十字左右，簡背皆有序號。簡文原有標題《周公之頌詩》，但有明顯刮削痕迹，應屬誤寫。現在的“芮良夫毖”這一篇題，是整理者根據其內容重新加以命名的〔2〕。

芮良夫是西周後期著名的大臣，以多次勸諫厲王、告戒百官著稱於世，相關事迹多見於典籍，如《逸周書·芮良夫》、《國語·周語上》、《史記·周本紀》等。《詩經·大雅》有《桑柔》篇，據《詩序》所述，屬於“芮伯刺厲王”的作品，芮伯即是芮良

*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清華簡的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以及清華大學文科振興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周代歷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1〕《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37 頁。

〔2〕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中西書局 2012 年。

夫，可見這首詩篇也是芮良夫所作。這些行為都充分體現了芮良夫對國事的操勞與憂慮〔1〕。

清華簡《芮良夫毖》文辭古奧，簡文先述周厲王時的形勢，次載芮良夫作毖的內容。芮良夫針對時弊所作的訓誡之辭，涉及君王應敬畏天常、體恤民意、德刑兼施、勿用奸佞以及君臣莫貪利享樂、應謹奉慎守等方面的治國之道。其中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簡文一開始對於當時形勢的描述：“周邦聚（驟）又（有）禍（禍），寇（寇）戎方晉。”對於這句話的含義，有必要在此作一些分析。

關於“周邦”一詞，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詞見於《尚書》和西周金文，如《周書·大誥》：“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克鼎（《集成》2836）：“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峻尹四方。”可見“周邦”意為周王朝。

“聚”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讀為“驟”。“驟”在古文中常有多次、頻繁之義。

“禍”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與“禍”字音義相同，是楚文字通行的寫法。“禍”字意為禍患、災害。

“寇”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為“寇”字之異體。《尚書·舜典》偽孔傳：“群行攻劫曰寇。”寇戎，當謂來犯之戎。

“方”字讀為“旁”，《說文》：“旁，溥也。”在此訓為“大”。

“晉”字，《說文》：“進也。”在此意為進犯。或讀“晉”為“臻”〔2〕，《說文》：“臻，至也。”意思也很接近。

總之，“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意思就是：“周王朝頻繁地遭遇了禍難，戎人大肆進犯。”

戎是周人對西部游牧民族的一種稱呼，或稱西戎。《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周人把周邊的少數民族稱為蠻夷戎狄，這一稱呼包含有一種自身文化優越性的意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說的“寇戎”，可能並不局限於戎人，而應該是對周邊入侵周朝的少數民族的一個統稱。

因此，清華簡《芮良夫毖》的這句話給我們揭示了周厲王時期的一個現實：周厲王在位期間，周王朝面臨着極其嚴重的外患，周邊的少數民族不斷入侵周朝，給日薄西山的周王朝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實際上，周邊少數民族對周朝的軍事威脅並不是自周厲王在位時才開始，周昭王

〔1〕2005年以來，在陝西韓城梁帶村一帶發現了大批兩周時期芮國的墓葬，更是引起了學術界對芮國的關注。

〔2〕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第67頁。

就是因為對南方用兵，最後死於漢水；周穆王也曾去征伐犬戎，等等。不過在此之前，周王朝基本上是主動出擊，而到了周厲王時期，由於政治黑暗，國力大為衰落，周邊少數民族已經變被動為主動，“寇戎方晉”，周王朝感受到了更多的軍事壓力。

關於周厲王時期的外患情況，在古本《竹書紀年》曾有所反映，如“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1〕，“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2〕等，可見戎狄和淮夷都曾大肆入侵周朝，從而印證了清華簡《芮良夫毖》“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記載。因此西晉的皇甫謐曾在《帝王世紀》中總結說：“自厲王失政，獫狁荆蠻，交侵中國。”〔3〕這些論述使我們看到了周厲王在位期間嚴峻的政治形勢。

周厲王時期邊疆地區的這種危機在《詩經》中也有反映。《大雅》的《桑柔》篇本身就是芮良夫所作，詩中有“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瘡，孔棘我圉”的語句，形象地反映了當時西周動蕩不定的情景。其中的“多我覯瘡，孔棘我圉”一句，毛傳：“圉，垂也。”鄭箋：“瘡，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毛傳與鄭箋對“圉”字的理解不太相同，毛傳把“圉”釋為邊陲，鄭箋讀“圉”為“禦”，訓為抵禦。但在對於全句的理解上，毛傳與鄭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全句意為“我們遇到了眾多的災難，我們的邊疆情況緊急”，可見這句詩與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說的“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其內涵是完全一致的。

《詩經·大雅》的《抑》篇，據《詩序》，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的詩作。其中亦說需要“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作”意為“興”，“戎作”即指戎人的興盛。衛武公也強調要加強軍事力量，用以戒備戎人的崛起，用以驅除蠻夷的入侵，其主旨與《桑柔》及清華簡《芮良夫毖》相比，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清華簡《芮良夫毖》、《詩經·大雅》的《桑柔》和《抑》篇，以及古本《竹書紀年》等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周厲王統治時期，周王朝頻繁地受到周邊戎狄等少數民族政權的進攻。可惜有關的具體情況，這些文獻中並沒有給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幸而青銅器銘文中的記述可以勾勒出更多的歷史細節。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自北宋以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中，有不少有關周厲王在位時期史事的詳細內容，極大地彌補了史書對於這一段歷史記載不足的遺憾。其中有關周厲王時期與戎狄等少數民族作戰的青銅器銘文，主要有宗周寶鐘、伯戣父簋、

〔1〕《後漢書·西羌傳》引，見《後漢書》第2871頁，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2〕《後漢書·東夷傳》引，見《後漢書》第2808頁。

〔3〕《太平御覽》卷八十五《皇王部十》引。

麥生盞、鄂侯駸方鼎、禹鼎、應侯視工鼎、應侯視工簋、鼗簋、晉侯蘇鐘、晉侯銅人、多友鼎等十多件器物。這些銘文的敘述往往遵循一定的格式，主要可分為戰爭時間、戰爭背景、戰爭過程、戰爭結果（包括殺死、俘獲敵人的數量，繳獲的戰利品等）、器主所受的賞賜，以及器主作器加以紀念的情況。如果依照銘文內容書寫的順序，可以看出周厲王時期的對外戰爭類銘文大致依次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 戰爭的時間和背景介紹，記載器主參加戰爭的原因。

從上述青銅器銘文來看，有明確紀年的是晉侯蘇鐘，指出是在惟王三十三年，亦即周厲王三十三年，其他的銅器僅記載了月份或者日期。如鼗簋是在“隹王十月”，晉侯銅人是在“隹五月”，多友鼎是在“唯十月”，應侯視工殷是在“唯正月初吉丁亥”，伯戣父簋是在“隹王九月初吉庚午”等。

至於戰爭的背景則一般與淮夷、玁狁的入侵有關，如多友鼎載“玁狁方興，廣伐京師”，鼗簋載“南淮夷竄及內”，應侯視工鼎言“南夷逆敢作非良，廣伐南國”，等等。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作為武將的器主們往往受到國君或權臣的委派，參加了戰爭，如應侯視工鼎和應侯視工簋稱王親自命令應侯視工“征伐玁”，鼗簋稱王命令鼗追襲南淮夷，伯戣父簋稱伯戣父“從王伐”，麥生簋稱“麥生從”，禹鼎稱武公派遣禹率軍與噩侯駸方作戰，而多友鼎所記多友追擊玁狁也是出於武公之命，等等。

2. 記載戰爭的過程以及器主的戰功。

這十多件有關戰爭的青銅器銘文都講述了戰爭的過程，有的記載十分詳細，如晉侯蘇鐘詳細記載了戰爭的發展過程，多友鼎也詳細描述了多友追擊敵人的經過，敘述栩栩如生；有些銘文敘述則比較簡略，如晉侯銅人僅用“晉侯搏戎”四字講述了戰事的激烈情況，應侯視工簋則用“休，克翦伐南夷”數字描述了戰爭的勝利，宗周寶鐘則用“王敦伐其至，踐伐卑都”說明大獲全勝的情形，都各有特色。

在列舉戰果方面，各器的表述也有鮮明的特點。戰功方面的體現多為“執訊……”、“折首……”、“孚戎……”、“孚金……”、“奪孚人……”，等等。其中晉侯蘇鐘、多友鼎、伯戣父簋及鼗簋都詳細羅列了戰功的細節，如晉侯蘇鐘稱晉侯蘇“折首百又廿，執訊廿又三夫。……折首百，執訊十又一夫”，又載“晉侯折首百又一十，執訊廿夫；大室小臣、車僕折首百又五十，執訊六十夫”，可謂是一份詳盡的功勞簿；多友鼎稱“多友有折首、執訊。凡公車折首二百又□又五人，執訊廿又三人，孚戎車百乘，卒復筭人孚。……折首卅又六人，執訊二人，孚車十乘，……多友或有折首執訊。……公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孚車不克目，卒焚，唯馬毆盡，復奪京師之孚”，詳細說明了多友軍隊殺死和俘虜敵人的數量，奪取戰車的情況，以及解救被俘民衆等方面的成果。晉侯銅人和禹鼎則舉出最重要的戰果，即擒獲敵軍的首領，如晉侯銅人稱

“獲卬君戣師”，禹鼎稱“獲卬君駮方”。應侯視工鼎、應侯視工簋僅言“我多孚戎”，麥生簋則稱“執訊、折首、孚戎器、孚金”，沒有詳細列舉戰功細節，記載比較簡略；而宗周鐘則有“𠂔𠂔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屍、東屍具見，廿有六邦”的記載，在周人強大的軍事力量威懾以及戰爭的不斷推進之下，南夷、東夷紛紛望風來降，總數達二十六國之多。因此該器中雖然沒有列舉具體的戰果，但與其他銘文相比，可知其戰功更為卓著。

3. 記載王(或器主的上級)對器主的賞賜情況及器主作器加以紀念的情形。

對於器主在戰爭中所取得的勝利，王或者器主的上司往往要對器主加以獎賞，賞賜的儀式類似於冊命，一般要在宗廟裏舉行，賞賜的東西有圭瓚、貝、田、矢、馬四匹、編鐘、美銅，等等。器主受到獎賞後，往往要表達感激之情，並要鑄造銅器，加以紀念，因此銘文的最末，往往還記載了器主作器的情況，以及希望子子孫孫永實用等一些套話。

根據這些銘文，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一些器物往往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記載同一次戰爭的，因此我們可以嘗試對這些銘文加以繫聯。

首先，宗周鐘銘文記載“王肇遘省文武堇疆土南或(國)，𠂔𠂔(子)敢𠂔(陷)處我土，王𠂔(敦)伐其至，𠂔伐卬都。𠂔𠂔(子)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屍、東屍具見，廿有六邦”；而伯戣父簋則載“隹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𠂔𠂔：麇、喬、潁”，𠂔𠂔指銘文中提到的麇、喬、潁等蠻夷方國，對比之下，可以判斷二者所述為同一戰役，即周厲王親自征伐淮夷的一次重大軍事行動；而麥生簋“王征南淮屍，伐角潁(津)，伐喬、遘”；鄂侯駮方鼎“王南征，伐角、𠂔”也同樣是反映了這次軍事征伐，因此這些青銅器當屬同一時期之物，只是由於作器者的身份不同，因而從不同的側面記載了本次戰爭。

上述這些銘文的繫聯，李學勤在《談西周厲王時器伯戣父簋》^{〔1〕}中已經做了很好的闡釋。除了上述這些銅器銘文外，𠂔簋可能也與此次軍事行動有關。𠂔簋言：“隹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𠂔)及內，伐滎，𠂔(留)參泉，裕(欲)𠂔(謀)陰(陰)陽洛。”所言的時間為十月，與伯戣父簋的“隹王九月”僅差一個月。楊樹達在《𠂔𠂔再跋》^{〔2〕}一文中已經正確指出：“遷與𠂔古音近，遷當讀為𠂔”，所謂的𠂔當指𠂔犯。西周大軍在九月採取軍事行動後，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西周軍隊的打擊下，有一部分淮夷𠂔犯到洛陽附近，於是厲王果斷地命令𠂔追襲，並大獲全勝。因此在同年十一月，厲王對𠂔加以獎賞。如果這樣來理解𠂔𠂔所載的這次軍事行動，可能更為合理一些。

〔1〕《文物中的古文明》第299—302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

〔2〕《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第58頁，中華書局1997年。

這次軍事行動可能一直持續至第二年初才結束。應侯視工簋載：“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應侯視工，伐淮南夷逆。’（逆）敢薄（迫）畢衆，瞻敢加興乍戎，廣伐南或，王命應侯征伐淮南夷逆，休，克翦伐南屍，我孚戎。”應侯視工鐘言：“惟王二月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視工遺王于周。”厲王回師後，應侯視工還專門向其獻禮，應該與這次軍事行動結束有關。

然而沒過多久，蠻夷方國又發生動亂。上次周厲王回師時曾設宴款待的鄂侯馭方，竟然率領南淮夷、東夷內亂，侵擾南國、東國。王朝軍隊受命討伐鄂國，因故受阻，後來大臣武公派叔向父禹會合王師，才擒獲鄂侯馭方^{〔1〕}。

晉侯蘇鐘也記載了一次大規模的伐南淮夷的戰爭。據鐘銘所載，此次行動發生於三十三年亦即周厲王三十三年，正月的時候厲王從宗周出發，前往成周，開始採取軍事行動，晉侯蘇在此次戰爭中殺敵衆多，戰功卓著，得到了周厲王的犒賞。另外一件晉侯銅人，可能也是記載此次戰爭。晉侯銅人銘云：“隹五月，淮（淮）屍伐格，晉侯廋（搏）戎，隻畢君戣師。”晉侯蘇鐘載：“王至淖列，淖列屍出奔”，王命晉侯追擊，“晉侯折首百又一十，執訊廿夫”，疑戣師也是其中被俘的人之一。到了六月，厲王即舉行儀式，犒賞晉侯蘇。

周厲王三十三年的這次軍事行動與討伐鄂侯馭方之間是否有關聯，還不易確定。不過禹鼎說“噩侯馭方達南淮屍、東屍廣伐南或、東或，至於歷內”，晉侯蘇鐘則言“王親適眚東或南或”，二者似乎有着同樣的背景，因此筆者懷疑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如果這一推測屬實的話，那麼鄂國滅亡的時間則可由晉侯蘇鐘的紀年而推定，是在周厲王三十三年左右。

從上述這些青銅器銘文來看，周厲王曾至少有兩次對淮夷用兵，並且都取得了勝利，但是南淮夷並沒有被平定，而且此後雙方還發生過戰爭。古本《竹書紀年》所言“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可能是在周厲王這些親征之後發生的事情。周朝的實力在這些征戰中受到了削弱，周厲王晚年實行專利的政策，可能也與戰爭中國力的損耗有一定關聯。

除了東南方向的用兵之外，周厲王還在西北與獫狁有過交鋒，對此多友鼎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古本《竹書紀年》言：“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其中所提到的戎狄可能也是針對獫狁而言。從多友鼎銘文來看，周人曾在與獫狁的戰爭中取得過局部勝利，但是後來卻未能够取勝。希望將來還能够發現更多有關周厲王時期在西北用兵的相關銅器銘文。來自西北和東南的雙重

〔1〕《文物中的古文明》第299—302頁。

威脅以及戰爭進一步削弱了周的實力，激化了矛盾，這也是導致國人暴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清華簡《芮良夫毖》“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記載，使我們看到了周厲王統治時期面臨嚴重外患的局面。本文從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兩方面闡述了這一外患的大致情況。應該說，周厲王時期除了內部的矛盾之外，還面臨着來自西北和東南的雙重軍事壓力，在這些方面周厲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給我們展示了豐富的材料。從這些軍事銘文來看，周厲王時期對於西北和東南的用兵都相當頻繁，在這些戰爭中，周人曾取得過一些重大的勝利，但是並沒有能夠完全將西北的獫狁和東南的淮夷徹底征服，也沒有能改變南北二綫始終面臨的軍事壓力。相反，在持續的戰爭過程中，周人反而逐漸被迫轉向防守。長期的戰爭與邊防的壓力使周人的實力遭到很大的削弱，也激化了國內的矛盾，加上周厲王采用暴政來鎮壓國人，最終導致了國人暴動。研究周厲王時期的歷史，不應忽視這些外患在其政治中所產生的影響。

(程薇 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